逆全球化的根源与中国的应对选择

孙伊然

【摘　　要】逆全球化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及其内涵,唯有置于逆全球化与国际格局变迁的背景下,方能得到准确的理解。本文从逆全球化的表象与特征入手,追溯其政治经济根源,进而剖析中国何以成为逆全球化矛头所指的对象,以及逆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最后探讨中国在逆全球化时代的应对选择。

【关 键 词】逆全球化;中国;发展战略;全球化

【作者简介】孙伊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17.5.5~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三重体系构建研究"(12&ZD08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亦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创新型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资助。

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英国全民公投脱离欧盟等重大事件为标志,逆全球化现象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从政界到学界,人们担忧的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停滞或倒退,更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本身的存续安危。弗朗西斯·福山撰文表达了这种情绪,在他看来:主导性的自由秩序可能被另一种"充满竞争而愤怒的民族主义世界"所取代;该风险的重大意义堪与上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终结相提并论。①

对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键参与者——中国而言,逆全球化及其潜在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逆全球化现象及思潮的重镇,是国际体系内的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越来越多地成为其矛头所指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内政外交总体战略的调整演进,与逆全球化及其背后的国际格局变迁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换言之,中国近年来大政方针、发展战略的内涵,唯有置于逆全球化及相应的国际格局背景之下,方能得到准确的理解。这也正是本文的目标所在。

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围绕如下核心问题展开:逆全球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它与中国有何关联?如何理解中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战略?具体而言,我们将从逆全球化的表象与特征入手,追溯其政治经济根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中国成为逆全球化矛头所指的原因,以及逆全球化对中国当前及未来发展的影响。最后探讨中国在逆全球化时代的应对选择。

一、逆全球化:表现及特征

"逆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全球化"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在学术研究或新闻媒体中,"全球化"的含义主要指向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即包括商品、资金、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不仅是各种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结构性过程",同样也是一种"制度性的过程"。②

为了突出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不妨以上述洞见为基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作出如下界定。全球化(逆全球化)同时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它指向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及其停滞或倒退);其次,它还指向支持和推动(阻碍或禁止)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政治进程。简言之,本文提及的“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既是经济现象,亦是政治进程。

以上述界定为基础,考察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内的诸般事实,就会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尽管倒退幅度不算严重、目前更没有全面逆转之虞,但作为经济现象与政治进程的全球化确实处在停滞、甚至某种程度的倒退状态。一言以蔽之,逆全球化已是客观实存,而不仅仅是理论假设。

从经济层面来看,贸易、金融乃至投资等诸多领域的全球化均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停滞甚至收缩。首先,就贸易而言,1951-2008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世界贸易增速都要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3]尤其20世纪90年代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贸易增速更是达到产出增速的两倍。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危机后的贸易增速已经持续数年落后于全球产出增速。[4]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2015年全球贸易放缓更趋明显:较之于2.5%的世界产出增速,当年商品贸易的增速仅为1.5%,足足落后了一个百分点。[5]

其次,金融领域的全球化更是经历了剧烈收缩。国际跨境资本流动在2007年达到11.8万亿美元的顶峰,占当年全球GDP的12%;随后数年间急转而下,到2012年已跌至4.6万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GDP的4%。与2007年相比,下跌幅度超过60%。[6]

再次,投资领域的全球化同样不容乐观。过去6年来,世界经济始终处于复苏乏力的状态,以直接投资、进出口占GDP比重来衡量的全球化从2010年起就时断时续,各种形式的投资都滞后不前。[7]从具体数字来看,201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76万亿美元,与危机前的峰值相比仍有7%的差距。[8]

与经济层面逆全球化彼此呼应、互为表里的,是政治意义上的逆全球化进程。用克鲁格曼的话说:“全球化正在遭遇政治围攻”。[9]对自由贸易、开放经济的疑虑和不满,已经深刻改变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局势。[10]发达国家在贸易等议题上的政策态度明显趋于保守,其中尤以美国为甚。[11]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候选人,均明确表现出限制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和倾向。[12]据《全球贸易预警》报告,从2008年11月至2016年5月,美国已实施636项歧视性措施,是所有G20成员国之中使用歧视性措施最为频繁的国家;仅2015年就出台了70项歧视性措施。[13]

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蕴含着两项重要特征。第一,逆全球化的起源地和重镇并非发展中国家,而恰恰是此前数十年间不遗余力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发达国家。如一些学者所言:反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全新事物,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才是新现象。[14]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概括道:二战以来,对自由贸易及其积极作用的认可一直是西方多数国家的共识;如今这种共识却已濒临解体。[15]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保护主义、本土主义在欧美各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支持者。[16]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极可能对自由贸易有所限制,问题只在于逆全球化的速度及程度而已。[17]

第二,此番逆全球化在发达国家有着相当坚实的民意基础,而绝非只是个别政治家或极少数边缘群体促成的偶发现象。调查显示:2016年,美国49%的普通民众对本国参与全球经济持负面态度,认为它在拉低工资水平的同时,还减少了就业机会;与之相反,对参与全球经济持正面态度的民众只有46%。[18]在英国公投中,那些受国外竞争影响、工作岗位大量流失的地区,以压倒性多数选择退出欧盟。[19]这些事实无不揭示着一种意义深远的转变,即主要发达国家民众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愈来愈从支持转向怀疑甚至抵触。[20]

二、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根源

有两个问题对于理解逆全球化至关重要。其一涉及逆全球化进程的行为主体;更具体地说,谁是逆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其动因何在?其二涉及逆全球化进程的发生时点,即为何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渐成声势、乃至近年来发展为席卷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强大思潮?如果能对此作出中肯的回答,那么我们对逆全球化的基本脉络也就具备了相对深入的理解和认知。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澄清一种似是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而非的误解，即认为逆全球化的主体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该看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隐含地将国家视为单一理性行为主体，止步于国家层面，而未能打开“黑匣”、审视其中因全球化而受损，诉诸政治进程以阻止全球化继续推进的次级行为体。的确，此番逆全球化的起源地与重镇位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是全球化进程的输家。事实上，以经济利益而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回报。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经济一体化每年都为美国创造约1万亿美元的收益；如果以家庭计，1950-2003年间美国户均GDP每年增长1.29万美元。[21]这一估计数字甚至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与采信：白宫网站在提及贸易收益时指出，“战后的关税削减使美国GDP提升了7.3个百分点，约合1.3万亿美元(以2014年币值计)的收益。如果将这些收益平均分配，就意味着每户美国家庭的收入因此得到1万美元以上的提升。”[2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也指出，仅2013年，产品与服务出口就为美国创造了1130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占到美国当年GDP的13.45%。[23]这些数据表明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那么，逆全球化发端乃至勃兴于美国，又当作何解释?简言之：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认清国家层面收益与个体层面收益的重要区别。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收益虽然丰厚，但这没有消弭其国内若干社会群体受全球化负面冲击而损失惨重的事实。

因此，逆全球化的关键主体并不是作为国家整体的美国，而是其国内因全球化而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更具体地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尤其中下阶层(包括非熟练工人、低技能劳动力等)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损者，他们直接承受着自由贸易、开放经济所导致的绝大多数负面影响，如相对收入下降、工作岗位调整甚至失业等等。相形之下，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劳动力是全球化无可争议的主要受益者。两类群体际遇之间的巨大反差，促使前者投身政治进程、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

相关研究与数据对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佐证。有学者指出，自由贸易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重新配置——后者导致部分工人失业甚至某些行业的萎缩，还意味着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可能出现恶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对发达国家的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造成了剧烈冲击。[24]作为其后果，美国已连续多年出现制造业部门的萎缩、就业人数的下降。[25]同时，发达国家的中位工资收入长期停滞，劳动报酬在GDP所占比重甚至持续下跌。[26]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的生产效率实际上远高于一代人之前，但普通民众却未能从中受益；总体经济增长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境遇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2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1990-2009年间，美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大幅下降了5个百分点。[28]

与美国中下阶层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所有者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的高额利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指出：1973-1985年，金融部门在美国企业利润总量中的份额从未超过16%；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21%到30%之间；及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该数字达到了惊人的41%。金融部门从业者的平均薪酬也在近三十余年间出现了迅猛增长，到2007年已经是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的1.81倍之多。[29]鉴于过去25年间，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并未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30]有充分理由认为：获利甚丰的受益者只是美国民众之中的一小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全球化确然导致受益与受损群体之间的潜在对立，以激烈的逆全球化方式做出应对也并非唯一选择。无论诉诸理论还是考诸历史，都可以觅得更加可取、更为良性的解决方案。[31]如果各国政府能够以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来调和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分歧和对抗，那么逆全球化的力量就可能被转化为保障全球化的动力。[32]就美国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前文已提及，美国每年从全球化进程获得的收益高达1万亿美元；与之相比，抵消全球化负面影响需要付出的调整成本每年仅为500亿美元。简单计算即可得知：美国从全球化获得的巨量收益，足以尽数弥补国内受冲击群体的损失而绰绰有余。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补偿了受损群体、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之后，美国仍然享有年均950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亿美元的净收益。

然而现实却是：补偿从未充分、及时地得到兑现。数据显示，虽然需付出的调整成本每年仅500亿美元，但美国实际用于解决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支出只有区区每年10亿-20亿美元。[33]有学者指出：通过补偿让所有人都成为赢家，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则大相径庭；即便相对慷慨的欧洲福利国家，提供的转移支付等措施也不够充分有力，至于美国则是根本无意采取类似举措。在美国，为帮助那些因贸易而失业者的调整援助计划早在1962年就已出台，但从中受益的工人寥寥无几；其他具有补偿性质的方案如工资保险等，在经历了数十年讨论之后仍然停留在设想阶段。[34]

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全球化输家无从得到弥补，与赢家之间的对立愈发难以调和。最终，逆全球化在愈来愈多不满群体的推动下应运而兴。由于多数国家不能或不愿采取有力措施，以保障全球化红利在民众之间得到广泛和公平的分享，[35]受损群体成为阻止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动力。以美国为例，2016年大选的焦点之一就是贸易政策：许多选民对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深怀不满，如今则更加担心贸易会威胁到自身的就业机会。[36]大选过程及结果已经表明：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群体的普遍支持，是特朗普得以胜出的重要原因。那些认为自身利益受到自由贸易损害的中产阶级、中下阶层，既是反全球化态度最为激烈的群体，也是特朗普的关键支持者。[37]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逆全球化为何此前声势不显、却在近年来蓬勃兴起，答案需要对不同阶段的全球化进行对比以寻求线索。从1945年至今的全球化已经历时70余年，其中不同阶段蕴含着关键且互有差别的内在特征。尽管从经济现象的角度观察，七十多年的总体趋势呈现为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扩展和深入；但若从政治进程的角度观察，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背后的政治安排及其特征，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迥然有别的图景。正是这一层面的差异，解释了(逆)全球化的转折及相应时点。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两幅示意图来简要地予以说明。

如图1所示，1945-2008年的全球化尚未出现明显的停滞或倒退。其中尤以1945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阶段为代表：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和奉行“内嵌的自由主义”理念，即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应当以保障国内稳定为前提。受其影响，各国一方面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则采取相应措施、努力将全球化导致的国内调整成本降至最低程度。[38]表现在图1，无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波动——如工作岗位调整甚至失业等，还是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差距，都会在政策层面引发相应的补偿措施，从而维系国内社会群体不致产生尖锐对立，也不致因此威胁到全球化进程本身。用鲁杰的话说，这一时期的贸易自由化颇为稳健，调整成本相对较低；在创造贸易得益的同时，相关风险大致由参与各方共同承担。[39]

到了1980-2008年间，自由化需以国内稳定为前提的规范性理念，已不再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政治安排，也从内嵌的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40]表现在图1，即主要发达国家已不再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波动及不平等做出政策层面的缓解或补偿回应。这当然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不过至少在该阶段，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运动尚未成形。之所以如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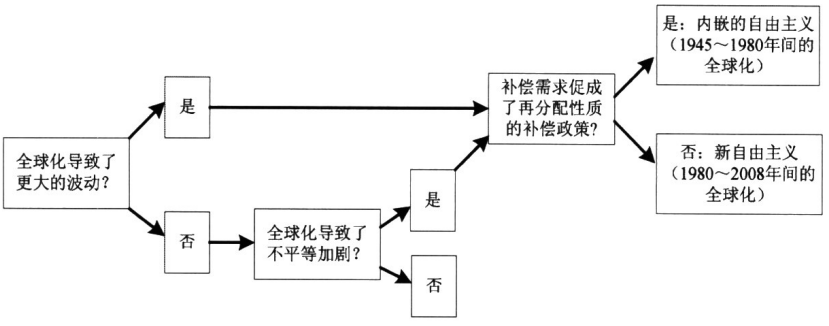

图1 1945-2008年的全球化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尽管美国并未采取有力的再分配措施化解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但它借助某些市场化机制和不具有直接再分配性质的政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普通民众尤其中下阶层的经济状况急剧下跌。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推卸自身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责任、将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交由市场机制解决，另一方面通过降息等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避免衰退。[41]通过此类政策组合，美国既规避了再分配措施，又使国内低收入群体能够维系基本的生活水准。尽管这些手段包含着巨大的隐患，但至少在泡沫破灭前，国内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愤怒得到了缓解。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在上一阶段采用的、蕴含着巨大隐患的政策组合终于招致严重危机，难以为继。换言之，美国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运用非再分配性质的政策措施来化解中下阶层民众的不满。在此背景下，本来就长期遭受全球化负面冲击的群体，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处境愈发艰难。这些群体的呼吁和诉求，以美国的民主政治机制为表达渠道，汇聚成为阻止全球化继续深入推进的关键力量。

如图2所示，面对全球化冲击之时，受影响群体有两种可选方案，其一是向内求解：即诉诸再分配环节；但这一求解方案在美国因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内部分裂而无法实现。其二是向外求解：即在无法获得再分配的情况下，受影响群体不再寻求补偿，转而全力反对自由化进程本身。此时，全球化因受到强烈的政治阻力而处于停滞甚至略有后退的状态，整个国际经济秩序面临不确定的态势和走向。在图2中，即A点所标记之处。

金融危机之所以在逆全球化进程中有如此关键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它凸显甚至加剧了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的不利处境。在2008年危机中，美国精英们设计的自由金融市场迅速崩溃，其导致的代价却更多地由普通民众承担。[42]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劳动者在面对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等负面冲击时往往更加脆弱、忍耐度更低。[43]各方面的数据也显示，美国中产阶级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群体：该群体的失业率和债务负担持续上升，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因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所的家庭超过200万户。[44]如此剧烈的境遇变动，自然反映在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之上。据调查，近年来对自由贸易协定持正面态度的美国民众逐渐减少，特别是最近两年(2014-2016)尤为明显：对自贸协定持消极看法的民众比例，由30%上升至39%；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之中，更是有压倒性多数(67%)的民众认为自贸协定将对美国造成损害。[45]这也印证了前文的判断，即逆全球化有其民意基础，那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又因金融危机而处境愈发艰难的普通民众。

三、中国与逆全球化：从形成机制到影响渠道

理解逆全球化的根源之后，对于中国而言，更具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是：逆全球化与中国有何关联？更具体地说，它包含两个彼此相关的子问题：其一，逆全球化的形成与中国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外部世界对这一点的解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其二，逆全球化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发展路径有何影响？——这实际上是外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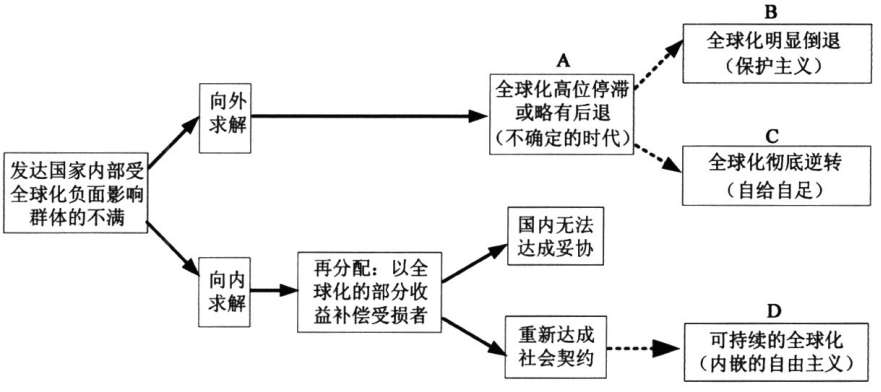

图2 2008年之后的(逆)全球化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在解读第一点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反应。

近年来,肇始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运动,愈来愈多地将中国作为指责对象。这一势头已经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注意和警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等场合多次指出:世界经济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46]那么,发达国家及其部分民众为何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如此排斥甚至抱有敌意?

这就涉及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发达国家内部中低收入阶层就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动。可以说,前后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克鲁格曼指出,20世纪90年代之后南北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张,对就业与收入分配产生了较诸此前更为显著的影响;用他的话说,“中国的出口确实取代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47]随着中国入世之后出口的显著扩张和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海外转移,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竞争行业在劳动就业及工资方面均受到长期的负面冲击;例证之一就是21世纪起初十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就业占比的急剧下降。[48]

美国部分产业尤其制造业受到的全球化负面冲击,大致体现在进口和投资两个渠道;两者均与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从进口来看,有研究指出:对应于每位美国劳工的、来自中国的进口额每上升1000美元,整体劳动参与率就下降2.1%,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数量下降约4.2%;同时,进口冲击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影响更为严重。[49]从投资来看,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张,意味着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购买更多设备、雇佣更多当地劳动力,美国本土的就业水平势必因此受到影响。[50]由于中国在近几十年间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加之美国政界部分人士有意无意地渲染甚至误导,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尤其是面临失业威胁的工人,开始将自身境遇的恶化归咎于中国。

受全球化影响引发的不满,又因为如下对比而进一步加剧:最近30年间,发达国家普通劳动阶层的收入几乎未见增长;而收入增长最快的,除了位于全球收入分布顶端1%的极少数群体外,就是中国的劳工阶层。[51]换言之,大多数全球化赢家来自于“复兴的亚洲”,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农村。[52]两相对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很容易将自身的际遇变动,归因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甚至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受益就是自身受损的原因。

必须指出和强调的是,上述看法禁不住严格推敲。事实上,从分析中并不能得出中国“应当”为逆全球化负责的结论。如前所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提升了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供给,与发达国家劳动者的际遇变动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性”绝不等于“因果性”。理解这一点的要害有二:其一,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净收益极为丰厚,即使在补偿全球化负面影响之后,收益规模仍然极为庞大;其二,在拥有巨量收益资源、完全有能力化解国内受损群体不满的情形下,多年来美国却一直对全球化受损者采取敷衍甚至忽视的态度,极少有实质性的纾困措施出台。因此,美国国内政策的失败才是导致逆全球化潮流的真正原因。换言之,如果说有谁应当为逆全球化负责,那么毫无疑问应当是美国政府和少数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利丰厚却不愿对受损者作出补偿的群体。

既然如此,为何少见发达国家改弦更张、匡正除弊之举?原因很简单: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多年奉行的政策范式、转而采取具有实质力度的再分配手段,在政治上的难度极高;尤其是鉴于近年来美国社会分裂的程度日深、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指望极少数全球化受益者与众多受损者达成妥协与和解,就更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与之相比,受损民众通过投票表达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满和愤怒,阻碍经济进一步深入开放,则要容易实现得多。

在此背景下,逆全球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就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思考。应该看到,一方面,中国之前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愈来愈多地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排斥甚至反弹,如今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未来发展的外部环境有趋紧的可能,特别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可能面临更多摩擦甚至冲突。这两方面构成了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逆全球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路径。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策略，无疑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但随着中国卷入全球市场体系程度的加深，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巨大体量不可避免地对该体系本身形成了冲击。许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并且提出了警示。用高柏的话说，“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是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市场力量的化身”，而市场力量的无限制释放必将激起发达国家强烈的政治反应；[53]如果不加控制，这一模式将使中国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导致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54]

事实上，对自由贸易以及中国的排斥，早在奥巴马任期内就已初现端倪。这一时期，美国政府频频运用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制裁措施，并且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等议题上对华施加压力，以期达到奖出限入的目的。[55]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资料显示：中国连续十年成为受美国“337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遭受此类调查的案件数量则逐年上升。[56]随着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的上升，以及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原本立场相对宽松、友善的欧洲各国也开始转变态度。[57]在欧盟内部，认为中国的竞争导致欧盟自身竞争力下降、经济低迷不振的看法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甚至赞同，进而促使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如对华贸易防护措施的拟定等等。[58]虽然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有其内在逻辑；但外部世界的要求甚至压力，也是中国必须正视的现实。

这一现实预示着，未来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有继续趋紧的可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逆全球化时，指出“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59]从当前形势来判断，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的美国，出台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性不容低估；这构成了中国将来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审视特朗普竞选以来的诸多言论，其保护主义政策倾向清晰可见。这直接引发了各界的担忧，即：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立场，可能对全球经济体系构成严重威胁；长久以来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系可能因此受损甚至中断。[60]对中国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在表达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时，特朗普明确将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归咎于中国。用他的话说，“中国加入WTO导致了史上最严重的工作机会流失”，“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贸易逆差之中，几乎有一半可归结为与中国贸易的结果。”[61]这样的态度并非偶然。据统计，从2011年至2017年，特朗普在推特(Twitter)提及中国时，有近半内容涉及中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经济议题，且95%的内容带有批判或指责意味。[62]

四、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策略选择

面对逆全球化背后的国际经济格局变迁，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潜在的经济摩擦或冲突，中国近年来已经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作出了相应调整和应对。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当前大政方针的内涵及脉络，唯有放在以逆全球化兴起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方能得到准确深入的理解。概言之，在内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外部整体环境趋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稳中求进”的发展路径。对内，这条路径表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方针；对外，这条路径力图稳定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维系全球化不出现明显倒退，同时致力于“一带一路”等由中国提倡发起的新型全球化及其推进。

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路径，既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应对策略，更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对此，可以从目标、形势、选择空间、具体策略等几个方面来解读：其中，目标提供方向上的指引；对形势的判断是决策的出发点；选择空间构成了决策的依据；具体策略则是决策的结果。

就目标而言，实现“两个一百年”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宏图大业；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即为此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63]

就形势判断而言，应当认识到：逆全球化的风险虽然客观存在，但目前更多的是处在“高位停滞”或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略有倒退状态，反映在图2即A点附近“不确定的年代”，而不是B点附近全球化明显倒退的“保护主义”状态，更不是C点附近全球化彻底逆转后的“自给自足”。[64]一方面，风险确实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低迷与波折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逆全球化倾向，以及美国相当一部分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消极态度，短期内出现转变的可能性不大。[65]这些因素使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压力。[66]

另一方面，当前形势虽不容乐观，但远未到需要担忧各国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地步。从数据来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在6%以上，近年来已降至1.3%。[67]用克鲁格曼的话说，“按照历史标准，贸易已经是相当自由了”。[68]鉴于这一形势，中国的关键利益并不是尽快推动高标准、严要求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将经济开放拔高到自身尚无力承受的程度；而在于确保开放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不出现急剧倒退甚至恶化。当然，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需要根据中国的选择空间来做出应对。

就选择空间而言，区分“可为”与“不可为”实属关键。其中，“不可为”主要是指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应当为美国国内政策的失误承担责任。即使美国自身不能或不愿实施补偿性的再分配措施来化解民众不满，在当今由主权国家构成基本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也不可能越俎代庖、介入美国内部事务。因此，中国的“可为”空间主要包含两个方向上的战略性调整。其一可以概括为“稳”，更多地具有防御性质；即推进本国经济结构转型，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以化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其二可以概括为“进”，更多地具有进取性质；即主动倡导以“一带一路”为脉络的新型全球化，引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种“稳中求进”的战略调整之所以可行，从“稳”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市场规模，以及相对齐全的产业结构等，为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提供了重要保障。从“进”的角度看，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开放度一方面仍有提升余地，另一方面从国别比较来衡量，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能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某种表率和拉动。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当前平均关税税率为9.5%，与全球平均水平(6.95%)相比尚有进一步削减空间。[69]与此同时，在新兴经济体之中，中国的开放度已经是最高的。按照市场准入等多种指标综合判断，中国在全球诸多经济体位居中上，明显优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其他新兴大国。[70]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中国已经是当今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力量。[71]这种实力和地位，是中国实施上述战略调整的坚实基础。

最后，就具体策略而言，当前诸多事件或迹象都表明，“稳中求进”的战略调整已经进入实施层面。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开展经济互动时，既明确表示自身对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支持，同时也充分尊重对方的关切或顾虑，努力寻求合作共赢的空间。李克强总理在会见美方代表时就指出，中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鼓励市场双向开放和平等竞争；还表示中国将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继续优化营商环境。[72]中国领导层的这种表态，无疑具有消解外部世界疑虑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致力于新型的经济全球化，努力使开放型世界经济朝着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其间，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吸引力将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全球化动力。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指出：中国将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仅未来五年，中国就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到7500亿美元。[73]此外，中国在国际机制层面的创议和推动，同样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助力和制度保障。无论是“一带一路”的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还是中新、中瑞、中韩等多个自贸区的建立，都表明了中国通过合作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坚定信念。[74]可以说，中国“稳中求进”的新发展路径虽然才刚刚展开，但其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已经开始显露。

注释：

①Francis Fukuyama,“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1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②高柏:《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78页。

③Cletus C. Coughlin,"World Trade: Pirated by the Downturn,"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August, 2009。

④Sebastian Mallaby,"Globalization Resets,"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 4, 2016, p. 9。

⑤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6, pp. 5-8。

⑥Susan Lund, Toos Daruvalak, Richard Dobbs, Philipp Härle, Ju-Hon Kwek and Ricardo Falcón,"Financial Globalization: Retreat or Reset?"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rch 2013, pp. 3-4。

⑦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为什么全球化是有代价的》,《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5期,第173页。

⑧金瑞庭:《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期的深层逻辑》,《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2月20日,第82页。

⑨Paul Krugman,"Leave Zombies Be,"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 4, 2016, p. 11。

⑩David Lipton,"A Two-Way Street,"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 4, 2016, p. 17。

⑪Maurice Obstfeld,"Get on Track with Trade,"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 4, 2016, p. 12。

⑫Sebastian Mallaby,"Globalization Resets,"p. 9。

⑬Simon J. Evenett and Johannes Fritz, Global Trade Plateaus: The 19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 London: CEPR Press, 2016, p. 119, pp. 29-30。

⑭周琪、付随鑫:《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4期,第2页。

⑮Lawrence H. Summers,"It's Time for a Reset,"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2016。

⑯Lionel Barber,"The Year of the Demagogue: How 2016 Changed Democracy,"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5, 2016。

⑰高柏:《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逆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第33页。

⑱Jacob Poushter,"American Public, Foreign Policy Experts Sharply Disagree over Involvement in Global Economy,"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28,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0/28/american-public-foreign-policy-experts-sharply-disagree-over-involvement-in-global-economy/。

⑲Frances O'Grady,"No Worker Left Behind,"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 4, 2016, p. 28。

⑳高柏:《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逆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第22页。

㉑斯科特·C·布雷福德、保罗·L·E·格里克、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美国在全球一体化中的收益",载[美]C·弗雷德·伯格斯滕主编:《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6、71页。

㉒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U. S. Trade,"May 2015, p. 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cea_trade_report_final_non-embargoed.pdf。

㉓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Benefits of Trade,"https://ustr.gov/about-us/benefits-trade#。

㉔Maurice Obstfeld,"Get on Track with Trade,"pp. 13-14。

㉕张丽娟、路婧:《奥巴马经济学:比较与评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第175页。

㉖Maurice Obstfeld,"Get on Track with Trade,"p. 14。

㉗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95、155页。

㉘UNDP,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Pathways to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73。

㉙Simon Johnson,"The Quiet Coup,"The Atlantic, Vol. 303, Iss. 4, 2009, p. 49。

㉚Maurice Obstfeld,"Get on Track with Trade,"pp. 13-14。

㉛约翰·鲁杰在考察二战后数十年间国际经济秩序相对顺利的运转时,将这种解决方案称之为"内嵌的自由主义折中"。参见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p. 379-415。

㉜孙伊然:《全球化进程的正反方、分野及其转化》,《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28页。

㉝[美]C·弗雷德·伯格斯滕主编:《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摘要"第4页。

㉞Alan S. Blinder,"Upside, Downside,"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 4, 2016, p. 33.关于补偿为何在政治上可行但难以实现,参见孙伊然:《全球化、失衡的双重运动与"内嵌的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115页。

㉟Maurice Obstfeld,"Get on Track with Trade,"p. 12。

㊱米利亚姆·萨皮罗:"美国大选年后的贸易政策",《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第170页。

㊲周琪、付随鑫:《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第7-9页。

㊳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pp. 398-399。

㊴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pp. 402-403。

㊵孙伊然:《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变迁:重建内嵌的自由主义?》,《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23-24页。

㊶孙伊然:《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第19-20页。

㊷Francis Fukuyama,"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㊸[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07-108页。

㊹周淼:《日益扩大的全球贫富鸿沟与未来全球局势的演变》,《红旗文稿》2015年第7期,第34页。

㊺Bruce Stokes,"Republicans, Especially Trump Supporters, See Free Trade Deals as Bad for U. S.," March 31,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 tank/2016/03/31/republicans- especially-trump-supporters-see-free-trade-deals-as-bad-for-u-s/。

㊻习近平:《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习近平:《坚定信心共谋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7日。

㊼Paul Krugman,"Leave Zombies Be,"p. 11。

㊽Maurice Obstfeld,"Get on Track with Trade,"p. 15。

㊾ David H. Autor,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6, 2013, pp. 2143-2145。

㊿ Ann E. Harrison and Margaret S. McMillan, "Dispelling Some Myths about Offshor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Vol. 20, No. 4, 2006, p. 18。

51"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 The New Wave," The Economist, April 2, 2016。

52Branko Milanovic,"The Tale of Two Middle Classes," Yale Global Online, July 31, 2014,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ale-two-middle-classes。

53高柏:《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中国改革》2005年第3期,第57页。

54高柏:《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86页。

55宋国友:《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31页。

56储昭根:《冷战后美国的经济安全与外交》,《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第152页。

57高柏:《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7日。

58郑春荣:《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与表现》,《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第49页。

59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7年3月17日。

60Francis Fukuyama,"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

61 Donald J. Trump, "Declaring American Economic Independence," June 26, 2016, https://assets.donaldjtrump.com/DJT_DeclaringAmericanEconomicIndependence.pdf。

62史书华:《分析:特朗普在Twitter上的"中国帖子"》,FT中文网,2017年2月22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427。

63章百家:《中国正面对新挑战——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经验的若干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第39-40页。

64至于D点附近"内嵌的自由主义"状态,诚然更为可取,但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采取适当且有力的国内政策措施,促成全球化受损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和解。近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甚微。

65邵育群:《美国与全球化关系的再定义——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第32页。

66章百家:《中国正面对新挑战——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经验的若干思考》,第39页。

67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 S. Trade Policy since 1934," p. 59.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us_trade_policy_since1934_ir6_pub4094.pdf。

68Paul Krugman,"Leave Zombies Be,"p. 11。

69金中夏:《中国面临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第46页。

70张宇燕:《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世界经济的视角》,《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第53页。

71章百家:《中国正面对新挑战——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经验的若干思考》,第40页。

72《李克强会见出席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并座谈》,来源:中国政府网,2017年6月2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06/20/content_5204020.htm。

73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74金中夏:《中国面临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重大挑战》,第44-48页。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